

# 中国子学史

下册



孟子，战国中期著名的儒家大师，中国传统儒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。他在论述与品德高尚的人交友时提出了著名的“知人论世”主张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载：“孟子谓万章曰：‘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，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，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。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，又尚论古之人。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是尚友也。’”孟子提出的与不同范围品德高尚的人交朋友的修养方法，反映了孟子严以责己、奋发进取的高尚品格。

通观《孟子》一书，孟子将身、家、国、天下及天人视为一个紧密相联的整体。他主张，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”，“人人亲其亲，长其长，而天下平”，“居下位而不获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也。获于上有道，不信于友，弗获于上矣。信于友有道，事亲弗悦，弗信于友矣……人们加强修养”，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……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”。《孟子》所论问题甚多，但从孟子思想的内在整体联系划分，不外乎个体问题、社会问题和天人问题，孟子的思想体系就是由个体论、社会论、天人论三个相互联系、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的系统整体……孟子所追求的个体的完善、社会的协调、天人的和谐，构成了孟学体系的主要内容。

王其俊 主编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

■ 王其俊 主编  
■ 山东教育出版社

# 中 国 孔 学 史

下册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中国孟学史(上、下册) / 王其俊主编. —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, 2012

ISBN 978—7—5328—6281—8

I . ①中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孟轲(前390～前305)  
—哲学思想—研究—中国 IV . ①B222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21136 号

## 中国孟学史(上、下册)

王其俊 主编

---

主 管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 版 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
(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:250001)

电 话: (0531)82092664 传真:(0531)82092664

网 址: <http://www.sjs.com.cn>

发 行 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版 次: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 787mm×1092mm 16 开本

印 张: 66 印张

字 数: 1105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—7—5328—6281—8

定 价: 146.00 元(上、下册)

---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)

(电话:0539—2925888)

# 目 录



## 第五篇 清代的孟学

第二十五章 明清之际的孟学 /512

    第一节 孙奇逢与孟学 /512

    第二节 黄宗羲与孟学 /515

    第三节 顾炎武与孟学 /520

    第四节 王夫之与孟学 /524

    第五节 李颙与孟学 /527

第二十六章 清初的孟学 /530

    第一节 陆陇其与孟学 /530

    第二节 唐甄与孟学 /531

    第三节 颜元与孟学 /538

    第四节 阎若璩、李光地与孟学 /541

第二十七章 乾嘉时期孟学的兴盛 /547

    第一节 戴震与孟学 /548

    第二节 翁方纲、崔述、周广业与孟学 /558

第二十八章 清代孟学研究集大成者——焦循 /572

    第一节 《孟子正义》的撰著缘由及过程 /573

    第二节 诠释孟子的人性论 /577

    第三节 纠正赵氏之误 深化赵氏之说 /585

## 第六篇 近代的孟学研究

第二十九章 龚自珍、魏源、曾国藩与孟学 /598

    第一节 龚自珍与孟学 /598

目  
录



第二节	魏源与孟学	/604
第三节	曾国藩与孟学	/608
第三十章	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章炳麟、孙中山与孟学	/613
第一节	康有为与孟学	/614
第二节	梁启超与孟学	/620
第三节	谭嗣同与孟学	/625
第四节	章炳麟与孟学	/631
第五节	孙中山与孟学	/636
第三十一章	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、胡适与孟学	/645
第一节	陈独秀与孟学	/646
第二节	李大钊、鲁迅与孟学	/651
第三节	胡适与孟学	/658
第三十二章	新儒家与孟学	/664
第一节	梁漱溟与孟学	/664
第二节	熊十力与孟学	/668
第三节	冯友兰与孟学	/670
第四节	徐复观与孟学	/673
第五节	唐君毅与孟学	/676
第六节	牟宗三与孟学	/679
第三十三章	杜国庠等思想史家及罗根泽、陈鼎忠、胡毓襄与孟学	/684
第一节	杜国庠等思想史家与孟学	/685
第二节	罗根泽著《孟子评传》	/687
第三节	陈鼎忠著《孟子概要》	/695
第四节	胡毓襄著《孟子事迹考略》	/700

## 第七篇 现代的孟学研究

第三十四章	现代孟学研究概述(上)	/712
第一节	孟学研究概况	/712
第二节	中国思想史论孟	/718
第三十五章	现代孟学研究概述(下)	/727
第三节	中国儒学史论孟	/727
第四节	郭店楚墓儒简与孟学关系研究	/731
第三十六章	孟学研究论集	/739
第一节	谢祥皓编《孟子思想研究》	/739

第二节	赵宗正等编《孔孟荀比较研究》 /745
第三节	丁冠之主编《孟子研究论文集》 /747
第四节	邹城市孟子学术研究会编《孟学研究》 /750
第五节	儒学全球论坛(2006)“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简介 /753
第三十七章	孟学研究论著(上) /761
第一节	王其俊著《孟学新探》 /762
第二节	谭承耕著《〈论语〉、〈孟子〉研究》 /767
第三节	翟廷晋著《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》 /769
第四节	杨国荣著《孟子评传——走向内圣之境》 /774
第五节	王成儒著《亚圣风范——孟子的智慧》 /777
第三十八章	孟学研究论著(下) /780
第六节	王其俊著《亚圣智慧——孟子新论》、《孟子解读》 /780
第七节	董洪利著《孟子研究》 /791
第八节	刘鄂培著《孟子大传》 /794
第九节	杨泽波著《孟子评传》、《孟子与中国文化》 /798

## 第八篇 港台地区及海外学者的孟学研究

第三十九章	钱穆的孟学研究 /812
第一节	《孟子研究》 /813
第二节	《先秦诸子系年》论孟 /821
第三节	中国文化视野中的孟学研究 /824
第四十章	孟学研究论集 /834
第一节	钱穆等著《论孟研究论集》 /834
第二节	吴康等著《孟子思想研究论集》 /836
第三节	李明辉主编《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》 /841
第四节	黄俊杰主编《孟子思想的历史发展》 /848
第四十一章	孟学研究论著(上) /854
第一节	王孺松、王支洪的孟学论著 /854
第二节	王基伦著《孟子散文研究》 /856
第三节	叶经柱著《孟子之民本主义》 /859
第四节	黄俊杰著《孟学思想史论》卷一、《孟子》 /861
第四十二章	孟学研究论著(下) /871
第五节	黄俊杰著《孟学思想史论》卷二 /871



- 第六节 李明辉著《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》、《孟子重探》 /878
- 第四十三章 当代海外学者的孟学研究 /885
- 第一节 杜维明与孟学 /885
- 第二节 成中英与孟学 /891
- 第三节 余英时与孟学 /896
- 主要参考文献 /902
- 附录一 孟子年表 /905
- 附录二 系统方法与孟子思想研究 /920
- 附录三 山东方志中的孟子形象 /931
- 附录四 孟子在国外的影响 /952
- 附录五 中国近现代孟学研究主要论著目录 /971
- 附录六 韩国朝鲜时代孟学研究著作简介 /1038
- 后记 /1045



## 第五篇 清代的孟学

## 第二十五章 明清之际的孟学

### 第一节 孙奇逢与孟学

孙奇逢(1585—1675),字启泰,号钟元,原籍明直隶保定府容城县(今属河北),后迁居河南卫辉府辉县。明清两代,他11次拒绝朝廷征聘,人称孙征君。晚年讲学于辉县夏峰村,学者称夏峰先生。清道光八年(1828),从祀文庙。

孙奇逢“少历经于贫贱,老困踬于流离”<sup>①</sup>,亲身经历了明亡清兴的朝代更迭。天崩地解的严峻现实和颠沛流离的贫困生活,造就了他探求治世之道、整治人心风俗的人生理想追求。他虽然一生身居山野乡村,却始终心系国家社会。在其社会政治活动中,他倡扬正义,痛斥邪恶,慷慨不顾生死,誓不为官以明志节,德操声闻朝野,充分展示了儒家学者居仁行义、深造自得、至善刚健的人格精神。

孙奇逢在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,精研儒学义理,博稽方志史实,尽心教化士民,勤力著述立说,尤能坚守学以致用的治学宗旨。他认为,学术的存亡兴废,关系着国家的强盛衰落,为学重在阐明义理以求切近人事,躬行实践以达经世宰物,而不可空谈身心性命,沉溺章句训诂。故他说:“遇事敢言,见危授命,而经世宰物,随地自见,此圣门之所贵于学,而其用甚大。若平居谈身心性命,一遇事便束手,此腐儒曲士之流耳,实足为理学之诟厉也。”<sup>②</sup>因此,孙奇逢所倡导和坚守的学以致用的治学宗旨,力挫了明末以来空疏清谈之陋习,开创了清代初期黜虚务实之新风。孙奇逢是明清之际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,他的一生正处于明朝腐败灭亡和清朝崛起兴立的社会变革时期。面对着动荡剧变的严峻社会现实和妄谈心性的空疏

<sup>①</sup> 孙奇逢:《夏峰集·東三无道人》卷七。

<sup>②</sup> 孙奇逢:《中州人物考·分类·理学》。

学风流弊，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，奋起抗击黑暗政权的残暴统治，积极倡扬儒家学说的理论精华，矢志挽救人心道德的沉沦衰微，与浙江黄宗羲和关中李颙一起被人们称为“清初三大儒”，其学术思想在明清之际孟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。孙奇逢一生著述颇丰，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《理学宗传》、《圣学录》、《北学编》、《洛学编》、《四书近指》、《读易大旨》、《书经近指》等，后人编有《夏峰集》、《孙夏峰先生全集》等。孙奇逢的社会活动和学术实践，促进了儒学的发展传播。时人馈以“始以豪杰，终以圣贤”<sup>①</sup>的美誉，以示对他的人格和学识的敬佩和称慕。

孙奇逢的理学思想，是在折衷调合理学与心学之争、反思明亡清兴的历史教训上形成发展的。他的理学思想特点，宗本阳明，兼合朱熹，具体表现为他既主张尽心知性体认天理，又强调躬行践履经世宰物。其弟子汤斌曾评曰，奇逢之学“以慎独为宗，以体认天理为要，以日用伦常为实际”<sup>②</sup>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三六《四书近指》提要亦评曰：“奇逢之学，兼采朱陆，而大本主于穷则励行，出则经世，故其说如此。虽不一一合于经义，而读其书者知反身，以求实行、实用，于学者亦不为无益也。”因此，孙奇逢的理学思想具体反映了明清之际儒学发展变化的显著特点。

### 一、尽心知性、体认天理的心本论思想

孙奇逢认为，尽心知性、体认天理是儒学思想的根本义理和一贯要旨。他继承、发展了孟子的“尽心知性知天”和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思想，认为体认天理在于尽心知性，人心即具万物之理，天理即是内在于人心的善性。他说：“欲观天地，观之于万物而已，万物所以成天也。欲观万物，观之于我而已，我备万物也。”<sup>③</sup>因此，孙奇逢将天、命、心、性、理合之于一，形成了心本论思想。他说：“心、性、天、命四字只一样，人具之为心，心之灵为性，性自出于天，天之一定为命。”<sup>④</sup>“天一命也，命一性也，性一善也。达而在上与穷而在下，同一命也性也，则同一善也。”<sup>⑤</sup>由此心本论出发，孙奇逢认为，儒学的本天之旨，就是本心之理，“知天，是知自心之天；事天，是事自心之天；立命，是立自心之命。总之，心生天生命也”<sup>⑥</sup>。

在识得本心体认天理的修养方法上，孙奇逢着重强调了慎独工夫。他

<sup>①</sup> 申涵光：《聪山集·征君孙钟元先生诔词》卷三。

<sup>②</sup> 汤斌：《汤潜庵集·征君孙钟元先生墓志铭》。

<sup>③</sup> 孙奇逢：《夏峰集·语录》卷一。

<sup>④</sup> 孙奇逢：《四书近指·尽心知性章》卷十七。

<sup>⑤</sup> 孙奇逢：《夏峰集·答魏石生》卷七。

<sup>⑥</sup> 孙奇逢：《夏峰集·理学宗传序》卷四。



说：“论本体只是性善，论工夫只是慎独。”“邹东廓云：‘除却自欺便无病，除却慎独便无学。’此语自道得尽千圣万贤，看切做工夫只有慎独。”<sup>①</sup>“慎独即毋自欺。独不但此心初动之几，凡事物交集时有独，即事物应酬后亦有独。初动之独，有严防法；交动之独，有密证法；即动之独，有挽回法。总之是慎独。”<sup>②</sup>慎独就是存养省察人心所具的善性良知，“只要人从本来处探讨得真切，而下手‘存养’二字，存养工夫又须做到尽头，不可歇手。静时默存，动时惺存，是谓存心。静是寂养，动是顺养，是谓养性。心性合而成身，存养合而成修”。孙奇逢认为，慎独就要戒慎恐惧，存诚去邪，这才能识得天理，成就善性，它是致知之首。“天命自我植立，有常存宇宙间者，故曰立命。此知天之圣，事天之极，而天命之性完全于心之结果处也”<sup>③</sup>。所心，尽心知性，体认天理，慎独存养不二，才是用功之处。

## 二、躬行践履、经世宰物的实行思想

孙奇逢理学思想的另一显著特点，在于他为了救治理学末流的空疏弊端，又强调了经世致用的实用实行思想。

孙奇逢认为，天理虽然内在于人心之中，但人只有在具体的现实实践活动中，才能识得吾心所具的客观事物之理。故他反对抛弃客观事物、专执内心求索的践道体理方法，而指出天道即表现于日用饮食之间，为学应于客观的现实活动中去明体达用，躬行践道。他说：“日用食息间，每举一念，行一事，接一言，不可有违天理拂人情处便是学问。”<sup>④</sup>“天之明命，无一刻不流行于人伦事物中，能于日用食息真见其流行不已，便自有下手工夫处。”孙奇逢指出，体认天理，尽心知性的根本途径，就在于现实人生活动中的躬行践履，学问皆从躬行得来，而不在于空谈心性。“日用间，凡行一事，接一人，无有不当理、中情之处，此所谓道也，即所谓学也”<sup>⑤</sup>，“道理只在眼前，眼前有相对之人，相对之物，静对之我，正所谓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。能尽人性，尽物性，皆是眼前事；舍眼前而求诸远且难，不知道也者”<sup>⑥</sup>。由于孙奇逢宗守阳明心学的工夫即本体、格物即致知之说，他认为知与行不可分割，下学与上达不可割裂，而其要则在于“学吾之心而已”。他说：“学为圣人而已。”“亦学吾之心而已。心以天地万物为体，其操功却在日用饮食间。故曰：不离日用常行内，直造先天未画前。尽心知性以知天，而圣人之能事毕矣。”<sup>⑦</sup>为学在

①⑤ 孙奇逢：《夏峰集·语录》卷二。

② 孙奇逢：《四书近指·所谓诚意章》卷一。

③ 孙奇逢：《四书近指·尽心知性章》卷十七。

④⑥ 孙奇逢：《夏峰集·语录》卷一。

⑦ 孙奇逢：《夏峰集·四书近指序》卷四。

于识得圣人之道，亦即是识得吾心之良知，而致得事物之理。他指出：“若分何时为下学，何时为上达，何处为卑迩，何处为高远，便于道理割裂。即此推之，形色亦天性，糟粕亦神奇。说心，在事上见；说体，在用上见；约理，在博文上见；致知，在格物上见。内圣外王，一以贯之，原无许多头绪。”<sup>①</sup>可见，孙奇逢的尽心知性、体认天理的思想，虽然宗本其心本论之说，但并没有空言明心见性，而是将明心见性寓于日用食息间的现实实践之中，提倡在客观的社会活动中去识得天理圣道。

由此出发，孙奇逢形成了注重经世致用的思想特点。他认为，理学的内容不仅包括了尽心知性、体认天理的心性修养，而且包括了事功节义、经世载物的现实实践。他说：“理学、节义、事功、文章总是一桩事。其人为理学之人，遇变自能殉节，当事自能建功，操笔自能成章。触而应，迫而起，安有所谓不相兼者？如不可相兼，必其人非真理学。”<sup>②</sup>理学之为圣人之学，就在于它内则能成就善性、识得天理，外则能经世宰物、经纶天地。理学之人要把尽心知性、经世致用的内圣外王的圣人之道，作为人生追求的主宰和把柄，这才不愧于理学，无愧于孔孟。

除上述外，孙奇逢还继承了孟子汤武革命和诛一夫等思想，强调重视民众的力量，反对残暴君主，并以孟子之言定案，认为“残贼之人，谓之一夫。一章之案，在此二字，以诛字易弑字，是《春秋》之笔。汤、武此举犯古今大难，亏孟子看得真，判得定”<sup>③</sup>。

孙奇逢的学术思想，既言尽心知性体认天理，又倡躬行践履学以致用，矫正了明末以来的清谈空疏陋习，开辟了清初崇实致用的一代学风。他的学术活动和思想理论，推动了清初儒学的复兴发展，在孔孟儒学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。

## 第二节 黄宗羲与孟学

黄宗羲(1610—1695)，字太冲，号南雷，学者尊称梨洲先生，浙江余姚人。他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、哲学家、史学家。他生当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矛盾、民族矛盾剧烈动荡的年代，亲身经历了明亡清兴“天崩地解”的朝代更迭。为了明辨天下治乱之源，寻求生民根本之计，黄宗羲在其

<sup>①</sup> 孙奇逢：《夏峰集·语录》卷二。

<sup>②</sup> 孙奇逢：《夏峰集·语录》卷一。

<sup>③</sup> 孙奇逢：《四书近指》卷十四。

一生的社会活动和学术研究中,凡《十三经》、《二十一史》经史之著,百家九流之学,天文历算之法,佛道典籍之书,靡不究心研治。又师从大儒刘宗周学,与弟宗炎、宗会并负才识,时有“浙东三黄”之誉。他猛烈批判了腐朽黑暗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,大胆提出了改革社会的理想方案,全面总结了宋明学术的演变发展,竭力开创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。他的政治著作主要有《明夷待访录》等,哲学著作主要有《孟子师说》、《易学象数论》等,史学著作主要有《行朝录》、《明儒学案》、《宋元学案》等。此外尚有《南雷文集》、《南雷诗历》等,另编有《明文案》等。他的社会批判的启蒙思想和通经治史的学术思想,在清代社会和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黄宗羲在明清之际孟学发展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地位,他上承刘宗周之学,深受王守仁心学影响,通过对孟子思想的重新认识,全面总结宋明理学的发展演变,提出了理气、心性、性情合一的学说。其代表作《孟子师说》一书,集中展示了他对孟子思想的认识。他在《孟子师说·题辞》中说:“先师子刘子于《大学》有《统义》,于《中庸》有《慎独义》,于《论语》有《学案》,皆其微言所寄,独《孟子》无成书。羲读《刘子遗书》,潜心有年,粗识先师宗旨所在,窃取其意,因成《孟子师说》七卷,以补所未备,或不能无所出入,以俟知先生之学者纠其谬云。”<sup>①</sup>黄宗羲虽然指出其作《孟子师说》意在承接师说,其宗旨则在于批判元明以来空谈性理、固守朱子之学的空疏僵化学风,还原孟子的思想。他对孟学的继承、发展、阐释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。

### 一、理气、心性、性情合一说

在理气观上,黄宗羲反对以理别为一物以及理先气后、理气为二的观点,认为气是客观存在的物质,是宇宙万物的本原,理是气之条理,是气的运行法则。他说:“天地之间,只有气更无理。所谓理者,以气自有条理,故立此名耳。”<sup>②</sup>“抑知理气之名,由人而造,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,则谓之气;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,则谓之理。盖一物而两名,非两物而一体。”<sup>③</sup>他反对程朱理学的“理在气先”、“理能生气”之说,指出理不离气,理气不二,“通天地、亘古今,无非一气而已”<sup>④</sup>,“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,生人,生物”<sup>⑤</sup>。气为天地间的主宰,理为气之理,无气则无理。他说:“气若不能自主宰,何以春而必夏、必秋、必冬哉!草木之荣枯,寒暑之运行,地理之刚柔,象纬之

<sup>①</sup> 黄宗羲:《孟子师说·题辞》。

<sup>②</sup> 黄宗羲:《明儒学案·肃敏王浚川先生廷相》卷五十。

<sup>③</sup> 黄宗羲:《明儒学案·学正曹月川先生端》卷四。

<sup>④</sup> 黄宗羲:《宋元学案·濂溪学案下》。

<sup>⑤</sup> 黄宗羲:《孟子师说·浩然章》。

顺逆，人物之生化，夫孰使之哉？皆气之自为主宰也。”<sup>①</sup>因此，黄宗羲在对宋明学者理气观上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后，对理气观进行了总结。他说：“盖大化流行，不舍昼夜，无有止息。此自其变者而观之，气也；消息盈虚，春之后必夏，秋之后必冬，人不转而为物，物不转而为人，草不移而为木，木不移而为草，万古如斯，此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理也。”<sup>②</sup>

黄宗羲在分析了理气关系之后，又用其理气观来论其心性观。他说：“夫在天为气者，在人为心；在天为理者，在人为性。理气如是，则心性亦如是，决无异也。人受天之气以生，只有一心而已，而一动一静，喜怒哀乐，循环无已。当恻隐处自恻隐，当羞恶处自羞恶，当恭敬处自恭敬，当是非处自是非，千头万绪，感应纷纭，历然不能昧者，是即所谓性也。初非别有一物，立于心之先，附于心之中也。”<sup>③</sup>他认为，在天，理为气之理；在人，性只能是心之性。因此，天人是相通一致的，而理气与心性也是一致的。即人心是受天之气而生，而人性则只是人心的活动之理，“离气无所谓理，离心无所谓性”<sup>④</sup>。黄宗羲的心性说发挥了其师刘宗周“慎独”之说，反对将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。他说：“孟子之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，因所发之情而见所存之性，因所情之善而见所性之善。师以谓指情言性，非因情见性也。即心言性，非离心言善也。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，器在斯道在，离器而道不可见……夫盈天地间，止有气质之性，更无义理之性。”<sup>⑤</sup>

黄宗羲以理气关系来论证心性关系，以气质之性来统一人的心性，故其总论心性关系时说：“在人亦然，其变者，喜怒哀乐、已发未发、一动一静、循环无端者，心也；其不变者，恻隐羞恶、辞让是非、牿之反复、萌蘖发见者，性也。”<sup>⑥</sup>他主张心性合一，认为“人稟是气以生，心即气之灵处，所谓知气在上也。心体流行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，即性也……流行而不失其序，是即理也。理不可见，见之于气；性不可见，见之于心；心即气也”<sup>⑦</sup>。基于心性合一的思想，黄宗羲阐发了他的性情合一思想。他说：“先儒之言性情者，大略性是体，情是用；性是静，情是动；性是未发，情是已发。程子曰‘人生而静以上，不容说。才说性时，他已不是性也’，则性是一件悬空之物。其实孟子之言，明白显易，因恻隐、羞恶、恭敬、是非之发，而名之为仁义礼智，离情无以见

<sup>①</sup> 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·崇仁学案三》卷三。

<sup>②⑥</sup> 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·崇仁学案二》卷二。

<sup>③</sup> 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·诸儒学案中一》卷四十七。

<sup>④</sup> 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·蕺山学案》卷六十二。

<sup>⑤</sup> 黄宗羲：《文约·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》卷四。

<sup>⑦</sup> 黄宗羲：《孟子师说·浩然章》。



性，仁义礼智是后起之名，故曰仁义礼智根于心。若恻隐、羞恶、恭敬、是非之先，另有源头为仁义礼智，则当云心根于仁义礼智矣。是故性情二字，分析不得，此理气合一之说也。体则情性皆体，用则情性皆用，以至动静、已未发皆然。”<sup>①</sup>

黄宗羲从其理气合一论出发，把人心和道心、天理和人欲统一起来，提出了“道心即人心之本心”的论断，批判了理学家们的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”的观点。他说：“仁无迹象可寻，孟子于无迹象之中，指出迹象，人人可以认取，如‘仁义礼智根于心’，‘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’云云，‘仁，人心也’，不一而足。盖人之为人，除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之外，更无别心，其憧憧往来，起灭万变者，皆因外物而有，于心无与也。故言‘求放心’，不必言‘求理义之心’；言‘失其本心’，不必言‘失其理义之心’，则以心即理也。孟子之言明白如此，奈何后之儒者，误解人心道心，歧而二之？以心之所有，止此虚灵知觉，而理则归之天地万物，必穷理而才为道心，否则虚灵知觉，终为人心而已！殊不知降衷而为虚灵知觉，只此道心，道心即人心之本心，唯其微也故危。”<sup>②</sup>在此，黄宗羲对把心分为道心与人心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，将人心与道心相贯通，持守了心即理的思想。

## 二、经世致用，求是务实

黄宗羲作为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，其学术思想贡献在于他批判了明末“束书不观、游谈无根”的空疏学风，提出了经世致用、实事求是的务实新风。在对孟子王霸之辨的认识上，黄宗羲强调心术是王道与霸道区别的关键所在，指出：“天地以生物为心，仁也。其流行次序万变而不紊者，义也。仁是乾元，义是坤元。乾坤毁则无以为天地矣。故国之所以治，天下之所以平，舍仁义更无他道……仁义功用，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，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。遗亲后君，便非仁义，不是言仁义未尝不利。自后世儒者，事功与仁义分途，于是当变乱之时力量不足以支持，听其陆沉鱼烂，全身远害，是乃遗亲后君者也。”他认为：“王霸之分，不在事功而在心术。事功本之心术者，所谓‘由仁义行’，王道也；只从迹上模仿，虽件件是王者之事，所谓‘行仁义者’，霸也。”治理国家的政治行为，一是看得见的事功，二是看不见的心术。心术并非指权谋机诈，心是指人人皆有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，术是指不忍人之心流行的轨迹。王道是以仁义善心来考虑民众的现实生活疾苦，实施爱民的仁政，一切顺仁心之自然流行。而霸道的出发点则是一己之私，考

① 黄宗羲：《孟子师说·公都子问性章》。

② 黄宗羲：《孟子师说·仁人心也章》。

虑的是自己的名声权势，其所做的事功可能是王者所做之事，但其行为却不是发自仁心，而只是在迹上模仿，是无源之水。所以，黄宗羲曾就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指出：“譬如草木，王者是生意所发，霸者是剪彩作花耳。”<sup>①</sup>黄宗羲对孟子仁政思想的认识，看到了“孟子本领阔大处”。孟子认为，实施爱民养民的仁政，为政者将自己的“好货”、“好色”、“好勇”、“好乐”之心扩充到民众身上，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，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。故黄宗羲说：“此见孟子本领阔大处。若使后之儒者对，必言治国当忧勤惕厉，岂宜纵耳目之欲？如此便觉拘迫。观孟子之言，自觉一段太和气象。”<sup>②</sup>可见，黄宗羲对孟子的认识，展示了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特点。此外，黄宗羲特别重视民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，继承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。他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予以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，认为封建社会的一切祸患弊害，源于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。他指出：“今也以君为主，天下为客，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，为君也。是以其未得之也，屠毒天下之肝脑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产业，曾不惨然！曰：‘我固为子孙创业也。’其既得之也，敲剥天下之膏髓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乐，视为当然，曰：‘此我产业之花息也。’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。”<sup>③</sup>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获得和巩固，是通过“屠毒天下之肝脑，离散天下之子女”、“敲剥天下之膏髓”、崩溃万姓之血肉的疯狂屠杀、野蛮掠夺而攫取的。封建君主为了一人一姓之产业、淫乐，屠戮天下之万民，无视万民之忧乐。因此，君主乃为天下之大害，“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，视之如寇雠，名之为独夫”<sup>④</sup>。他以反对君主专制为前提，肯定了民众是国家的主体，提出了“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的光辉命题，认为国君是天下百姓的佃客佣工。他通过区分“治”、“乱”两个概念，表达了自己对民众的重视，指出“天下之治乱，不在一姓之兴亡，而在万民之忧乐”<sup>⑤</sup>，确定天下是治还是乱的标准，并不在于一家王朝的兴衰，而在于万民的忧乐。既然民众是天下的主体，民众获得幸福，就是治；如果民众处于痛苦之中，那就是乱。国家社会的主体原本是天下百姓，君主政治活动的目的只在于维护天下百姓的利益，而后世的封建专制君主却自立为国家的主宰，因而导致了天下的动乱。他主张，保证民众的生存，就要授田于民，让民众有其耕地以为衣食之本，同时还要减轻民众负担，减少苛捐杂税。如同孟子认为职业分工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，黄宗羲也充分认识到了工商之民在社会

① 黄宗羲：《孟子师说·孟子见梁惠王章》。

② 黄宗羲：《孟子师说·王立于沼上章》。

③④ 黄宗羲：《明夷待访录·原君》。

⑤ 黄宗羲：《明夷待访录·原臣》。



发展中的重要性,提出了“工商皆本”的主张。

黄宗羲在清代学术史上地位的确立,在于他系统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,提出了改革社会的启蒙思想,彻底抨击了明末空谈心性的浮风流弊,倡导了经世致用的为学新风。同时,他不仅是浙东学派的开创者,也是清代史学、经学的重要创立者。因此,他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和学术思想研究方法,在明清之际的孟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。

### 第三节 顾炎武与孟学

顾炎武(1613—1682),原名绛,字忠清,明亡后,改名炎武,字宁人,江苏昆山人。曾自署蒋山佣,一署顾圭年,学者称亭林先生。顾炎武自幼便在家庭的教育下,攻读经史及兵家典籍。14岁为诸生,与挚友归庄共入复社,讲学论道,畅谈国事,时有“归奇顾怪”之说。后屡试不第,绝意科举。在明末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,他“感四国之多虞,耻经生之寡术”<sup>①</sup>,乃毅然抛弃科举帖括之学,博综群书,志在经世。他广览历代史书、方志等,辑录有关农田、水利、矿产、交通及地理沿革等方面的材料,致力于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、《肇域志》的纂辑。崇祯十七年(1644)明亡,清军南下,顾炎武在苏州、昆山参加了抗清斗争。失败后,虽已家破国亡,仍然辗转大江南北,志图恢复。后因恢复无望,又遭恶人陷害,遂于清顺治十四年(1657)弃家北游,往来于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各地20余年,进行实地考察,广泛交友论学,从事著作撰述。他矢志坚守民族气节,多次拒绝清廷征聘。康熙时开明史馆,召征博学鸿儒,他坚辞不出,以死力拒。清康熙二十一年(1682)卒于山西曲沃。顾炎武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、经学家、史学家。在明亡清兴“天崩地解”的剧烈动荡时期,他在对明朝覆灭的历史反思中,猛烈抨击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弊端,力倡明道救世的社会变革学说,深刻揭露了空谈心性的理学危害,开创了崇实致用的治学风气。顾炎武的一生,无论是在明道救世的社会活动中,还是在崇实致用的学术实践中,都为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。在整个清代学术发展史上,他不仅享有“清学开山”之誉,而且又以“行奇学博”著称。

顾炎武一生治学著述,旨在“明学术,正人心,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”<sup>②</sup>,故其于经、史、地理、音韵、金石、诗文等学,均有精深造诣,且多见诸著述,

① 顾炎武:《亭林文集·天下郡国利病书序》卷六。

② 顾炎武:《亭林文集·初刻日知录自序》卷二。